

从“利奇”到“斯科特”：西方国家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中国的话语权

陈啟喆

(百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 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从宏观的国家研究向微观的族群研究转变的趋向。在这一转变中, 英国学者埃德蒙·R. 利奇和美国学者詹姆斯·C. 斯科特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这些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也冲击了中国的民族概念理论体系。中国学者面临一个怎样定义自己国家民族概念的问题——是被动适应国际话语体系还是主动参与体系的构造? 在民族概念的国际话语体系中,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关键词: 西方国家; 东南亚研究; 族群概念; 人类学转向;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5-0096-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17

From “Leach” to “Scott”: an Anthropological Orient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s Discourse Right

CHEN Qizhe

(School of Marxism, Baise University, Baise, Guangxi, China 533000)

Abstract: Since 1960s,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changed from macro country research to micro ethnic studies.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British scholar Edmund R. Leach and American scholar James C. Scott are the two researchers who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m. Their research has promot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s has also impacted the national concept and theory system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are faced with a definition of their own nation, a passive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explain that China must have its own ri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concerning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western countrie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anthropological orientation; discourse right

在本文的开始, 笔者想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 虽然文章的名为“东南亚研究”, 但从摘要看来, 大家不难发现其主要是以有关东南亚的历史问题的探讨为主而很少涉及现实问题。文章如此安排固然与其讨论的内容有关, 同时也与笔者自身的学术背景有关。其次, 文章标题中的“西方国家”不是指具体的某几个或一些国家, 而是指在国际上通行的研究话语体系之一。

本文企图探讨在“西方价值观”下的东南亚

研究(尤其是有关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转变。这种转变笔者认为是从以往的偏重于宏观的国家政治、经济等的综合研究转向偏向微观的族群等的人类学研究。在该转变过程中, 英国学者埃德蒙·R. 利奇和美国学者詹姆斯·C. 斯科特无疑是比较耀眼的明星, 他们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于族群概念体系的再认识。这些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 在今日全球化背景下毫无疑问也冲击着中国国内的民族概念理论

收稿日期: 2017-09-22

作者简介: 陈啟喆(1975—), 云南昆明人,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

体系。近年来，中国学者面临一个怎样定义自己国家的民族概念的理论 and 现实问题——究竟是被动适应国际话语体系，还是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来参与民族概念理论体系的构造？笔者认为，在民族概念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一、西方国家早期的东南亚研究简述

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19世纪以后。就分期而言，《剑桥东南亚史》对于东南亚史研究的分期有借鉴意义。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作为分界，将东南亚史研究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进行总结^{[1]1-2}，因为该书认为正是二战中才开始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大战中设立了“东南亚战区”^[2]。

二战之前的东南亚史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没有形成把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概念”^{[1]3-4}。虽然这个时期也有像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这样的例外，他的著作《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就是不同于该时期其他以国别为主的东南亚史研究。^{[1]5}赛代斯还引领了战前西方东南亚史研究的另一种普遍趋势，就是“学者们都倾向于把该地区的历史视为由外来影响造就而不是源于当地动力的产物”^{[1]5-7}。这种影响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主要是指东南亚周边强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其中印度文化影响之广大，以至于当时的大多数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习惯于把该地区视为“外印度”或者“大印度”^{[1]5}。虽然同样强调“印度化”的影响，但赛代斯与同时代的另一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者J. C. 冯·李尔不同。前者的观点偏重于文化传播论，而后者则是文化进化论的。不过赛代斯在论及中华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时，似乎又持进化论的观点。《剑桥东南亚史》中认为“赛代斯关于印度影响是如何传入的观念”与冯·李尔最大的相似点则在于强调印度文化的这种影响“并非由于征服或殖民化”，而起源于贸易。^{[1]6}需要指

出的是，赛代斯等西方学者简单地把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看作是武力扩张的伴随物，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3]

二战前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是域外的外来观察者，即使是少数东南亚本地区的，也均是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具有现代国际传统的学者。他们关注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关注的是东南亚早期的历史，企图把得自考古、碑铭和文献方面的零碎资料缀合为先前未考察过的编年史的纲要。其次，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列强16世纪以后在东南亚的活动到逐渐建立商业和领土帝国以及在那儿推行的殖民政策。”^{[1]2-11}

二战后初期，在东南亚史研究方面比较著名的是英国学者D. G. E. 霍尔及其大作《东南亚史》。该书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把东南亚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学术著作^①。该书强调从东南亚自身出发研究其历史，而不是把该地区作为印度、中国或西方的附属部分。霍尔认为，西方早期的东南亚研究之所以会把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影响过度强调，这是因为那时候相关的研究材料有限，大多数研究者只能通过梵文或者中文来了解和研究东南亚历史。^{[4]20-21}

二、西方国家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如前所述，在研究东南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印度、中国、伊斯兰、欧洲等外来文化的吸收问题时，学界不可避免地陷入纷争之中。冯·李尔认为早期的研究者过分强调了欧洲的影响；约翰·斯梅尔则认为研究中应该保持一种道德中性的观点和亚洲中心的努力，而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家们承认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秩序与权力等问题的关注。他们对农业社会不时发生的骚动、起义和反抗运动的研究兴趣，无疑受到诸如詹姆斯·C. 斯科特对马来亚农民秩序和反抗等的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影响。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史的问题，不仅有利于保持研究者“中性主义”原则和贯彻“东南亚自主性”的研究，而且

^①从该书书后的参考文献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东南亚研究的那些大量的国别研究无疑为霍尔的这部对整个东南亚进行整体性的通史研究贡献了可供借鉴的前期成果，否则很难想象凭借个人的力量完成这种大作。

能把研究提升到文化解释层面意义上来。因为毕竟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如同“不发达”等概念也被认为带有歧视性而换为“发展中”等中性的话语体系一样;同时后现代等思潮日益冲击着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基础,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盛行也使包括东南亚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疑真正客观历史的存在可能。

(一) 背景介绍

二战后在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无论是为了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领土民族主义,还是争取各国内部民族平等的族群民族主义,都广为流布。最初,民族主义运动大部分被描述为以包容了异族人口的领土为基础,而不是共同的文化特征为基础的族群主义。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种族歧视的公愤很容易被东南亚民族主义政治家用作斗争的资本,它为各种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用于进攻的有利的着力点。^{[5]205-210}因此,“东南亚的普遍趋势是在欧洲殖民统治划分的领土范围内为反殖民活动提供建立国家的推动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往往是按疆域与行政制度来划分的社会。在有的学者看来,在东南亚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只有泰国。^{[5]235}

另一方面,来自“19世纪的欧洲”的“‘民族主义’指的是认为人类被分成不同群体的观念——根据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身体外貌来区分民族和社会,以及认为这些‘民族’应该是独立主权国家基础的观点”没有为“诸如东南亚这类拥有不同语言、宗教、文化和身体外貌的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提供一种合适的既定政治制度模式”^{[5]209}。现代东南亚民族平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其具体情况是:“除新加坡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往往把国民分为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尽管有些”外族人“在当地生活了几代,而且成为新近独立的国家的公民。这些外族人所获得的利益被广泛地认为是以土著人的付出为

代价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对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严格限制或禁止移民的国家到战后便很快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从而结束了外国劳动力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样一个世纪,但很少发生更激烈的驱赶外族居民的事件,只有民主柬埔寨采取了大规模的驱赶行动。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更加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系统的歧视态度使外族人自愿离开本国,特别是50-60年代从缅甸迁出的南亚人和70-80年代从越南和老挝迁出的华人。”^{①[5]392}

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后,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挫败的影响,使得西方世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研究都热情高涨。各种与东南亚研究相关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置,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如人类学、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学、文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注重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微观研究。^{[1]11-13}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强调了历史学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技术借鉴,同时它也是当时现实当中的迫切任务——为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参考的需要。这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把东南亚视为一个地区的看法日渐传播”,而到了这时“大多数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作和社会科学研究仍然以个别的国家而不是整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1]14}。这个时期虽然仍有如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这样的企图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的方法来撰写东南亚历史的,但是学界更多的是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对相邻学科的技术进行借鉴和吸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这一时期专家们的东南亚研究“明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6]。

(二) 利奇与《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

《东南亚史》作者霍尔认为,“今日的东南亚是人类学学者的乐园”,“在深山和丛林中生活的,有代表东南亚人种史上各个较早阶段的多种多样种族的残存者”^{[4]21-22}。因此,东南亚不仅给

①引文中的“50-60年代”和“70-80年代”,皆指的是20世纪。

人类学家提供了天然的田野基地，同时人类学家在东南亚所做的研究也为深化东南亚研究做出了贡献。在这里，首先对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及其他的成名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进行分析。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 1910—1989），1910年生于英国西迪芒斯，早年在剑桥大学马尔伯勒和克莱尔学院学习医学，1933年起在一家贸易公司的中国分部任职。利奇不喜欢周围的商业气氛，不久便辞职回国，途中考察了雅美族。回国后经雷蒙德·弗思的介绍，他进入马凌诺斯基门下学习人类学。从1939年起，利奇开始研究克钦人。当时，因二战爆发，他遂参加驻缅英军，并于1946年退役。退役后，利奇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讲师，次年获博士学位，1953年起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1971—1975年任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75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被授予爵士爵位，1989年因病去世。除《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外，利奇的主要著作还有《普艾里亚：一个锡兰村庄》（1961年）、《重新思考人类学》（1961年）、《列维·斯特劳斯》（1970年）等。^[7]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经典”和“东南亚研究者之必读书”^{①[8]}。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认为，该书“分析的是社会发展的诸动力或个人行动的诸原则”，利奇在书中的分析基于“通过观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为而获得的经验材料”的动态分析即结构性变迁分析，解决了一般建构模型因为均衡性要求而丧失的动态分析能力的问题。在弗思看来，利奇的动态理论是特殊案例而不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因为它适用于缅北地区人群的行为，它认为“追求权力是社会选择的基础”，而其他的一些民族志研究则认为道德和宗教层面上的价值判断高于权力和地位的追求。^{[9]1-5}

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首先对英国人类学界以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为代表的“一套粗略和过分简单化的均衡假设”提出质疑。“这套假设源自把社会系统的结构类比为有机体结构”，从而把社会系统“说成好似它是自然存在的真正的实体，而内在于这类系统的均衡也似乎是固有的”。利奇认为这种观点不是事实，他的这本书就是要“指出这种印象实为幻象”^{[9]6-9}。其次，该书的核心主题是要说明“克钦人的实际政治行为是他们顺应两极分化的‘贡萨’和‘贡劳’政治信条的一种折中”^{[9]13}。利奇研究的克钦山区（Kachin Hills Areas）的族群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人：“掸人居住在河谷，在那儿的灌溉农田中种植水稻；他们相对比较开化，其文化多少与缅人有些相似”；“克钦人则居住在山区，他们在那儿主要以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种植稻谷”。^{[9]19}过去的研究惯于把克钦人描述为“原始和好战的野蛮人，与掸人在外表、语言和一般的文化上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应该认为他们在种族起源上也颇为不同”。而利奇则认为，“克钦人和掸人几乎在哪儿都是近邻，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他们也常相互牵扯到一起”^{[9]19-20}，“在政治组织问题上，克钦社区在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来回摇摆——一极是贡劳‘民主’制，另一极是掸邦‘专制主义’。现实中大多数克钦社区在类型上既非贡劳制也非掸邦制”，它们按照书中称为“贡萨”的体制进行组织，贡萨实际上是贡劳制和掸邦制的一种折中^{[9]28-29}，所以虽然“克钦人和掸人相互轻视”，但是“据信这两族人拥有共同的祖先”^{[9]39}。也就是说，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提出的“钟摆型”（oscillation）动态平衡的民族认同变迁模式，即缅北民族的族性（ethnicity）可能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而改变为他们所需要或者被需要的族性和认同，如克钦人（Kachins）变成掸人（Shans），或者贡萨（gumsa）变为贡劳（gumlao），从而对民族实体论（即原生派 primordialist）造成冲击，掀起了民族建构论（即建构派 constructivist）的浪潮。^{[9]iii-xiii}

①此一评语是王先生总结《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发行以来西方学界众多好评之语。个人认为王先生把该书书名中的“Highland Burma”译为“上缅甸”比该书中译本的“缅甸高地”较好，因为这是该地区的一个专有名词。不过为了避免理解歧义，本文还是沿用中译本的书名。

(三) 斯科特的研究

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斯科特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 其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年)、《比较政治腐败》(1972年)、《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年)、《弱者的武器》(1986年)、《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年)、《国家的视角》(1998年)、《逃避统治的艺术》(2009年)^①等。斯科特的研究多以东南亚为田野基地, 属多学科交叉, 其早期偏重于比较政治学。而《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对“文明以外”的山地居民的研究则较偏重于人类学的思考。该书曾获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费正清图书奖(2010年)和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授予的福冈亚洲学术奖(2010年)等多项奖项, 并有法、日、中等多国文字译本, 在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533-536}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我们前面涉及的一些重要著作在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前言”的感谢语中被联系起来, 如“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教科书……两卷本的《剑桥东南亚史》”, 再如“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不断地参阅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才能有所成就”, 等等。^{[10]前言5-7}

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要讨论的是赞米亚 (Zomia) 这个“现存最大的地区, 那里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 它在地理上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 具体来说“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 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 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 居住着1亿少数民族人口, 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 语言多种多样”^{[10]前言1}。

斯科特企图通过对赞米亚的这些少数民族在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蓄意和反应性的无国家历史”的考察, 来解构文明历史中关于“野蛮”、“生”和“原始”的论述, 指出这些词汇其实代表了那些族群“未被统治”或者“尚未被纳入国家体制”, 因为“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民族或‘部落’开始的地方”^{[10]前言2-3}。可以看出, 斯科特定义的族群已经不再是有着具体名称的如“克钦人”“掸人”等等具有语言和文化意义的族群, 无论他们是“建构的”也好还是“原生的”也好, 书中所讨论的是“赞米亚”这种不进入“文明国家”架构的“野蛮人”的集合体。其实这只是斯科特研究中一贯地对“弱势群体”关注的表现, 只不过这次关注对象由过去的“文化国家”内的底层农民的关怀, 变为那些更为凄惨的, 可能已被、将被“文明国家”奴化或者驱赶、屠杀的, 曾经选择逃避到高山或者文明边缘的族群。

三、族群概念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话语权

过去关于民族的理论一般认为, 作为民族标记的语言、习俗和社会与政治类型的种族特征是不变的, 而我们前面提及的利奇等学者的研究却证明了许多民族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动。也就是说, 族群认同的原生论 (primordialist approach) 日益受到工具论 (instrumentalist approach) 的挑战。原生论强调族群认同的心理和情感因素, 认为“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 它是人性中某种非理性的原生情感的外化, 或某种植根于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的表现”; 工具论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无时不在计算和优化自身的利益。族群认同生成于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中”。^[11] 笔者认为不能机械地套用原生论和工具论, 因为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概括关于人类历史上的族群认同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人群往往依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倾向于不同的认同基础, 时而文化和心理的因素比较关键, 时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更为重要。

^①出版日期均指英文原版。另外《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四本书国内已经有中译本出版。

在东南亚研究中，中国学者要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有自主的“族群”“族群认同”等相关概念体系。英文“ethnic group”一词一般被对应翻译为“族群”，汉语里有个与之相关的概念为“民族”（Minzu）。由于我国对56个民族的称呼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故此英文“ethnic identity”也对应可以翻译为“民族认同”。当然在中国国内语境的境况下，这种“民族认同”显然与“national identity”不应混为一谈，其实后者翻译为“国家认同”更为贴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是我们熟知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并且指出给民族强加上“第五个特征”即“具有自己的单独民族国家”的做法是错误的。^[1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并不认为民族是与国家必然联系的概念。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族群”和“民族”概念的争论，推进了我国相关方面研究的进展。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研究认为，研究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在四个领域拓展和推进：其一，要从梳理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入手；其二，要注意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其三，要关注西方民族理论的最新成果和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其四，要注意对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借鉴。马戎的观点中最引起争议的就是所谓“去政治化”。在其早期的文章如《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14]里，他对新中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质疑，往往是引起其他学者争论的所在。如王希恩的《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一文，就不同意马戎关于新中国初期民族政策是套用前苏联政策的看法，并对新中国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制度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肯定性评价，同时指出马戎用“少数族群”取代“少数民族”和用“族群政策”取代“民族政策”不但与我们固

有的话语体系冲突^[15]，而且还易引起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猜疑。实际上正如王希恩教授上文所述，这种固定话语体系不仅浸透在我们的政策语言、社会语言中，而且也是很久以来我们学术语言中广泛认可和使用的。一般作为常识性都应该知道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指的“民族”，在中国话语体系下是包括两层含义的：其一，是指“族群”含义的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其二，是指代表国家的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但是，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国内学者研究中不当的混淆使用，以及国外某些学术团体和个人的有意歪曲，使这个学界本应该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成为“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纠正这种错误使用，对那种有意歪曲行为要提高到法律层面的追责。马戎教授近些年的研究已经对他过去的“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提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指出这种提法的本质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16]这篇文章引起了笔者多年来思考的一种共鸣，这就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不是一回事？

虽然从英文“national identity”字面上可以翻译为“国家认同”或是“民族认同”，显然前一种是现在通行的译法，而后一种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旧译法，当然在我国台湾地区也习惯于译为“国族认同”^{①[17]}。笔者个人的意见是应该统一或者规范为“国家认同”，这是居于我们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性质和利益的考虑^{②[18]}。前面本文已经论述了现在的国家一般多为多民族国家，谈到国家认同时显然与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现在更多用“ethnic identity”来表示多民族国家内每个具体民族的民族认同。这样在研究领域就可以明显区分，避免过失性的混淆和不必要的纠纷。而且，笔者认为这些概念界定也应该提高到国家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和统一，毕竟我国现在提倡建设法制社会和依法治国。马戎等一批学者的贡献就是让“ethnic group”成为翻译和表达我们国家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的有效和通用词汇，但其不足就是试图根据这个英文词组本身直译意思把国内已经成为惯用汉语名称由“民族”改为“族群”。其实，不需要强

①这个也有例外，如台湾初版的《教育大辞书（六）》里就“国家认同”词条英文就是“National Identity”。

②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就认为nation用于“国家”的意思更多。

行去修改现行已经约定俗成的56个民族的“民族”一词,只需在研究中清楚地表明这个“民族”代表的是“ethnic group”意义上的群体,而非“nation”意义上的。当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概念纠纷,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使用“族群”一词来代表这个意思。

再者,那种盲目推崇民国时期延续到今天台湾地区还在使用的“国族”理念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国族”构建不过是以“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族裔民族主义”,本质上难脱“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嫌疑。^[19]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20]。鉴于现今学界对于这些概念界定出现的众说纷纭局面让人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概念和话语体系做出必要的界定,建立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尼古拉斯·塔林. 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 [M]. 贺圣达,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2] 贺圣达. 东南亚历史编纂学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剑桥东南亚史》评述 [M] //李晨阳,祝湘辉. 《剑桥东南亚史》评述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13.
- [3] 赛代斯. 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M]. 蔡华,杨保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译者前言.
- [4] 霍尔. 东南亚史:上册 [M].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 尼古拉斯·塔林. 剑桥东南亚史:第2卷 [M]. 贺圣达,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M]. 甘会斌,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2.
- [7] 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311.
- [8] 王筑生. 社会变迁与适应:中国的景颇与利奇的模式 [M] //周星,王铭铭.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724-726.
- [9] 埃德蒙·R. 利奇.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 [M]. 杨春宇,周歆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0] 詹姆士·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M]. 王晓毅,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6.
- [11]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346-349.
- [12]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M] //斯大林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64.
- [13] 斯大林.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M]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87-288.
- [14] 马戎.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J]. 北京大学学报,2004(6):122-133.
- [15] 王希恩. 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17.
- [16] 郑茜,牛志勇. “‘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意思,就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对话马戎教授 [J]. 中国民族,2011(9):4-12.
- [17] 教育大辞书(六) [M]. 贾馥茗,总编纂. 台北:文景书局,2000:519.
- [18] 绫部恒雄. 民族、国家和民族性之概念 [M]. 郑信哲,译//朱伦,陈玉瑶. 民族主义: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
- [19] 姚大力. 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 [M] //周平,李大龙. 中国的边疆治理:挑战与创新.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31-336.
- [20]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M]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6.